

知識生產與輸出的雙向行動主義

文／謝鎮逸

主題：Response and Responsibility: Politics, Poetics & Ethics in Five Arts Centre' s Emergency Projects

日期：2021.09.26

主講：Mark Teh（馬來西亞藝術工作者、五藝中心成員）

與談：Zikri Rahman（馬來西亞跨領域文化藝術工作者）

主持：林之滄（獨立製作人）

「五藝中心」（Five Arts Centre）從 1984 年成立至今，一直秉持著跨領域成員的「協作」模式（collaborative）；其中包括視覺藝術家、電影人、劇場人、舞者、設計師、研究者、行動主義者等。在相異領域大致上甚少往來的馬來西亞，「五藝中心」可謂是極為理想性的創發性藝術組織。主講人 Mark Teh 是該組織的核心成員之一；在本講中除了敘述「五藝中心」近年來對於紀錄劇場的行動與實踐，也分享了其創作的劇場作品《華玲》（Baling）。

戰後十年間的東南亞是多事之秋；許多新興國家正準備脫離殖民統治；1955 年的萬隆會議對國際格局的影響持續到今天，同年的「華玲會談」（Baling Talks）也讓馬來西亞建國史敘事走向了不同的道路。1955 年，在英殖民政府的「馬來亞緊急狀態」下，由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召開，並與時任英屬馬來亞行政長官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後來成為馬來西亞教科書上的「國父」）、英駐新加坡行政長官大衛·馬紹爾（David Marshall，後來成為新加坡「國父」之一）進行和解談判、要求馬共合法化。談判破局後，拒絕投降的馬共從此走入叢林並在國界邊緣進行武裝鬥爭，直至今日仍不被國家歷史所接受。

《華玲》以大量文獻的閱讀與實地走訪、口述採集開始，並從 2005 年發展演出雛形至今，慢慢藉由現場裝置、文件、影像、表演等構建出完整的模樣，以更全面地重新敘述歷史、國族與個人身份的張力關係。除了劇場作為演出空間以外，更多次在公共空間如停車場、校園走廊、熟食中心等非制式空間作為表演場域，目的是為了爭取隨機觀眾的參與，一起打開重新理解歷史的對話。不僅從「觀眾」到「公眾」，過去這些年來的演出重製也因應不同時期的「再研究」（re-research）新發現、政治情境、表演者身份游移等而幾經改版。就一個作品的生命而言，《華玲》顯然再也非關僅僅的劇場作品，而更是一種行動主義。

雖然對於國際交流論壇的適切性，始終難以避免講座的極大篇幅在於引薦馬來西亞的非官方歷史敘事及其藝術轉化形式，但這些說明仍然重要的一點在於：對特定地區之共產黨宿命的認識論藩籬。Mark 分享了一件有趣但很關鍵的現象：當到不同國家巡演時，一些特定地區的觀眾因為對「共產黨」概念的偏見與誤解，而對他們抱持許多質疑。相較於其他地區的共產黨與社會主義走向極端，反倒是曾經幫助馬來亞作殖民抗爭的馬共，最終只能成為噤聲的歷史。

與談人 Zikri Rahman 提問到，演出從這十多年來，每一次的演出如何面對敘事政治與情感政治的轉化問題？尤其，如何避免掉入純粹的感傷與創傷？Mark 最終以「讓話語成為行動，讓文本成為情感」作結，並指出唯有讓討論一直「懸而未決」，才有持續擴增更多檢驗並辯證歷史與當代性的可能。

無論是前置檔案研究或是數次演出版本的轉折，能夠構成不同層次上的表演檔案（performance archives），那麼在（成為動詞的）「表演檔案」（performing the archives）時，行動性何以進一步擴散？《華玲》在後期版本藉由「多重身份的表演者個人」，輪番交替演出「華玲會談」的不同角色——除了更多群眾的參與，這種回頭探問檔案表演者作為表演生產者的關係鏈再運作，除了讓個體身份政治問題始終冤魂不散的馬來西亞，有機會從創作源頭自省式的內爆，反向質問知識生產與輸出端的極限，並予之突圍。